学历之间隔着什么

我的一个叫王战飞的同学，当年读中学的时候，常常被我们这群优等生嘲笑，不仅成绩远远落在我们后面，还时常在上课的时候，成为大家醒脑的笑料。那时老师也都不屑理他，听他鼾声渐响，就一个粉笔头砸过去，他常瞥一眼老师，惺忪地嘟哝一句：干嘛打扰人家睡觉啊，就又倒头睡去。他对师道尊严如此轻慢，除了带给我们一时的小喜乐，也会让我们私下里有小小的敬佩，觉得这厮的满不在乎里，其实是有种不怯上的勇敢在的。但究竟还是不屑占了上风，想，考本无望的他，再怎么折腾，估计将来也就是在底层混罢了。

所以毕业写留言，好多骄傲的优等生都不屑找他；等到他借扩招才考取了一个三流大学的专科时，更是没多少人提起他。后来和我一样成绩优秀的学生，在本科读完后，又纷纷考取了一流大学的硕士，再然后便是赶上就业难的大潮，许多人胆怯，硬着头皮又去读博士。考不上的只好就业，东奔西跑，最后我们这群人里，有找到海尔公司去的，大家都已是羡慕至极。

半年后，无意中和那个去了海尔的同学相遇，竟很惊讶地得知，我们曾经集体嘲弄的王战飞，在同学去海尔之前，就已经升任海尔的区域经理了。而硕士毕业的他，不偏不倚地被老总分到王战飞的手下，而且，只能从业务员做起。我以为同学会觉得嫉恨且委屈，但他却是叹一口气，说：现在我知道，专科与硕士之间，其实只隔着极微小的距离；在学校里我们可以叱咤风云，但一旦出了校门，只要有王战飞的那股子劲，学历的距离和作用，就几乎是微乎其微了。

据说这家伙读大学时，也是那副对什么都满不在乎的神情，学习平平，虽然任着学生会干部，但从来不像一般的同学一样，在领导面前毕恭毕敬，他基本上是把领导当成与自己平起平坐的普通人看待的。而且这厮能上能下，学生会正混得如鱼得水时，突然辞了职，用自己学到的不多的经济学知识，在学校里开始实践。赔了不少钱，但也赚了不少。不管是赔赚，他都一笑了事，还说，只要我人在，怕什么呢？

他的这种张狂，常被周围的人取笑为无知，想他毕业的时候，自会吃苦头，知道一个专科生，在这个看重学历的社会上，并不是像他想像的那样，什么都可以做成的。

所以大家毕业的时候，都因了自己的学历进行定位，觉得和高学历的竞争也是徒劳，不如定好位，找份工作，安安稳稳地做下去。王战飞却不，他几乎忘记了自己的学历，和一大帮学士硕士甚至博士们，挤在一起应聘。有一天中午午睡起来，他睡眼惺忪地就去了海尔的应聘会场。身边的一大堆人，都是一副严肃紧张、西装革履的模样。唯独他，不仅没像别人一样，带厚厚的个人简历，而且神情放松，似乎他不是来参加一场竞争残酷的应聘，而是从容地散步路过此地，一时兴起，就来小坐。

所以他进去的时候，连考官都是惊讶。当被问及来应聘什么职位时，王战飞闲谈似的反问考官，你们有什么职位呢，你们需要什么我就可以做什么。就是这样被考官称为“吊儿郎当”的模样，让他顺利通过了初试，且在接下来一连串的复试中，因从容自如打动了考官，最终留在了海尔。考官说，他是所有来应聘的人里，惟一一个不把海尔当回事的。甚至，他的举止里，有把海尔当一无名小企的倾向。但恰恰是如此，让考官觉得，这人在业务的开拓上，必有无限的潜力和勇猛。

考官果然没有猜错，王战飞从最底层的业务员开始做起，一路势不可挡，三年后便因出色的业绩，升为区域经理。当我们还在因就业压力而不得不准备考研时，王战飞连本科都没有读，就进了海尔。四年后，我们毕业，竞争依然是残酷，但王战飞，却是到达我们不敢奢望的高处。而且，在我们一贫如洗的四年里，赚到了40多万。

专科与硕士之间，原来只是小小的一步。**摘自《东西南北·大学生》**

半个朋友

半夜里，有人敲门，来人是大学同学林雪峰。林雪峰一身风尘，原来黑色的行李包变成了灰色，裤腿上沾有两小片草叶。他苦笑说：“我出来快半年了，跑了许多地方，还没找到工作。看，弄得一副狼狈相。”

我赶紧招呼老同学洗澡，吃饭，安排他睡觉。妻子悄悄说：“这个人住在家里，我怪不舒服的，你得想办法让他快点走。”我也担心林雪峰长住不走，可怎么好意思赶人家呢？妻子献计说：“我们推说要出差。他总不至于一个人赖在我们家吧。”

第二天早上，我对林雪峰说：“我们两口子都要出差，两个月后才回来，很抱歉不能招待你了。”林雪峰笑一笑说：“没关系，吃完早饭我就走。”

临走的时候，林雪峰说：“我想把行李暂时放在你的车棚里，不知道行不行。”我当即打开车棚门，让林雪峰把行李放进去，顺便给他一把车棚的钥匙。

第二天，我发现车棚扫得干干净净的，墙角有两块折叠整齐的纸板。原来，林雪峰晚上在车棚里睡觉。我愧疚地对妻子说：“我的老同学一定是走投无路才来找我，我这样对他，太不应该了。”我要把林雪峰叫回家里来。妻子说：“你疯了，我们已经说去出差，再叫他回来，不怕丢脸吗？”我问：“那怎么办？”妻子说：“以后我们不能在家里弄出太大的响声，晚上不要开灯，上下楼时小心，总之，不能让林雪峰知道我们在家。”

从此，我们两口子像做贼一样，即使不坐摩托车，也戴着头盔上下楼。直到一个月后，在信箱里看到一把车棚的钥匙，我们俩才长出一口气。林雪峰只留下钥匙，没有留下地址。

天有不测风云，三年后，我供职的公司破产了。我也像三年前的林雪峰一样，到处找工作，到处碰壁。正在心灰意冷的时候。有一天，林雪峰打电话来，问我愿不愿意到他的公司去。林雪峰已经是一家公司的经理了。

我喜出望外：“你怎么知道我失业了？”林雪峰说：“其实，我一直在关注你。”

我惭愧不已：“我……我以前骗过你。”林雪峰说：“我知道，那次，你和妻子一直在家。”

我问：“那你为什么……”

林雪峰说：“在我走投无路的时候，曾经找过许多朋友，没有一个人愿意收留我，只有你很爽快地把车棚的钥匙给我。因为有你的车棚，我才站稳了脚跟，才能继续去找工作。不瞒你说，那时候，我身上只剩下十元钱。你比其他朋友好得多，我应该感谢你。”

我不知道说什么好，两行泪水无声地流下来。**摘自《北京文学》**

货币化亲情

他是个孝子，他的母亲先后两次住院，他衣不解带，端屎端尿地跑前跑后忙活，连临床的老太太都夸，说你这个儿子，比我的女儿都要贴心。老婆说你们家又不是你一个儿子。他摇摇头，说可我就这一个母亲。

都知道他伺候病人体贴入微，所以厂子领导安排陪床的时候第一个想起的就是他。他不太乐意，说又不是我的父母，凭什么。领导就说了，按正常上班给你算工资，连加班费都发给你，伙食费报销一半。如此一算，倒也轻松合算，就答应了。

遭遇工伤的人是我哥哥，被机器轧掉了三根手指头，生活尚能够自理，我还经常去帮他洗洗衣服，送点营养品，所以除了打饭陪伴，跑值班室喊护士挂吊瓶，他并没有其他的事可做。到了晚上就花五块钱租一张小床，在走廊里和衣睡一晚上——也有单位报销。

哥哥出院的时候，他竟有些恋恋不舍，给哥哥出主意：就跟大夫说感觉还不太好，要求多住几天。哥哥说在这里住了三四十天了，难道你还愿意继续陪我住在这里？他说，在这里玩着每个月都能挣一千块，这样的好事谁不想着继续下去啊。

回到厂子上班，他还经常想念在医院陪床的日子，说那才叫神仙过的呢，真想再去陪几天。他的母亲又住院了，他终于又“如愿”去医院陪床了。但是这次陪床他却心里不甘起来，憋了几天后终于和自己的兄弟姐妹闹腾了起来，说以前给别人陪床，活儿比这还轻松一天都值三十多块钱，我在这里陪床替你们尽了孝心，总要给我点补偿吧？

就因为钱的事，终于闹翻了。他愤愤地回单位上班，把自己的母亲一个人扔在医院里。老婆劝他，说咱尽咱的心，攀比别人干什么。他依然愤愤不平：“她又不是我一个儿子！”

哥哥跟我讲起时连连叹息：当亲情可以拿金钱来衡量时，就已经不是亲情了。 **摘自《时代青年》**

亲切的甩门声

张大伟是个出租车司机，一般要到后半夜才回来。老婆嫌他没出息，跟人跑了。老婆跑后的第一个晚上，他回到家，像是跟谁撒气一样，“嘭”一声，甩了一下门。

张大伟家的对门邻居是刘阿婆，今年七十八岁了，半夜里，睡得最香的时候，张大伟“嘭”的一声甩门声，把刘阿婆吓了一跳，醒了。

这以后，张大伟半夜里回来，都习惯性地甩一下门。刘阿婆等到一点，又等到两点，还是没听见张大伟的甩门声，刘阿婆便有点不安了，起床反反复复上了几回卫生间。老人家起床趿拖鞋的脚步声，惊动儿子阿强，阿强问刘阿婆：“妈，您怎么了？”

刘阿婆说：“对门的大伟现在还不回来，我睡不着。”儿子惊讶了，他想妈妈是怕睡着了被甩门声惊醒，所以要等到张大伟回来甩门才放心睡。

阿强想了一晚，第二天，买了一小瓶润滑油去找大伟：“大伟呀！你的门关起来有点响，尤其是半夜里。我妈人老了，听不得一点惊响，一惊就醒。我猜你这门轴也许生锈了，要擦点油，所以我就买了点润滑油送来。”

张大伟知道阿强的话中有话，拍拍阿强的肩膀，说：“我知道了。”这天晚上，张大伟半夜回来，轻轻地开了门，又轻轻地关了门，连上楼也是轻手轻脚的。可是，这天夜里，刘阿婆一夜没合眼。

原来刘阿婆听惯了张大伟的甩门声了，听不见甩门声，心里不踏实，反而睡不着，有一天半夜里，刘阿婆把儿子叫醒，说：“阿强啊！你害得妈睡不着觉了。听不见张大伟的甩门声，我心里就不踏实。他是个出租车司机，万一有个闪失，人回不回来都不知道。明天你去叫张大伟，让他在半夜里回来的时候，把门甩一下，我听到甩门声，就知道他平安回来了。”

阿强一听，眼眶有点湿润了。第二天，他又在张大伟的家门口等他。张大伟见了，说：“阿强，你又怎么了？我半夜里回来，可是轻手轻脚的啊！”阿强说：“大伟，是这样的，我妈说，你是个出租车司机，听不到你的回来甩门声，她心里不踏实，所以你在半夜里回来时，请你甩一下门，算是向我妈报一声平安。”张大伟一听，眼眶也湿润了。

这以后，刘阿婆都要等到张大伟回来，听见了他的甩门声后才睡觉。张大伟回来，也一定会轻轻甩一下门，仿佛在告诉刘阿婆：我回来了。

这样，一晃就过了大半年，一天晚上，刘阿婆等到凌晨两点钟，还听不见张大伟回来的甩门声，就叫醒儿子说：“阿强，张大伟今晚是怎么了，到现在还没回来。八成是出事，你打他的手机看看。阿强打张大伟的手机，没人接。刘阿婆担心起来。叫阿强到张大伟的出租车公司去问问看。

凌晨两点多，阿强打的到张大伟的出租车公司问，张大伟的确还没有回来，再打手机，还是没人接。于是，出租车公司还没有收车的司机全部出动，最后，在城郊的七里路，找到了出车祸跌下路沟昏迷了的张大伟，大家马上把张大伟送到医院进行抢救，一个小时后，张大伟醒来了。

一醒来，张大伟就拿出一串钥匙，对个陪伴他的同事说：“我想请您到我家去，帮我甩一下门。”这位同事吃惊地说：“为什么？”张大伟说：“我要向我邻居刘阿婆报一声平安！” **摘自《品味》**

非常男女

一生只爱你

奶奶披着红盖头出嫁了，娇艳欲滴的脸庞挂着泪。她还没见过未来的丈夫，她才16岁。新婚之夜，爷爷惴惴不安。他读过书，是受新旧文化双重影响的少年，他才14岁，他怕他不爱盖头下的新娘。蜡烛快燃完了，爷爷颤抖着双手掀开盖头。就是那一低头的温柔，吸引了爷爷；爷爷的温文尔雅也深深打动了奶奶。新婚之夜，他们便一见钟情。爷爷问：“你爱我吗？”奶奶害羞地点点头。爷爷问：“你会永远爱我吗？”奶奶想了想，摇摇头。爷爷有些失望。

为逃避国民党抓壮丁，爷爷只身从四川乡下逃到重庆。他找到了大展拳脚的天地，可谓乱世出英雄，从拉煤工到工头，从成立搬运队到创办产煤公司，爷爷的事业蒸蒸日上。爷爷身在繁华的“陪都”，心却依然系在乡下老家没见过世面的奶奶身上。奶奶夜晚读着丈夫寄来的书信，白天里勤勤恳恳地耕地、侍奉公婆。爷爷的朋友都笑他不讨小老婆，爷爷的父母也委婉地劝他休了奶奶，娶一个城市妻子，哪怕他们日夜受着奶奶的照顾。花花世界，爷爷不为所动，他始终记着那一低头的温柔。新中国成立后，爷爷作为爱国实业家，当上了一个不大不小的官儿。他把乡下的妻儿接到城里，分离几年的夫妻终于团圆。奶奶娇艳的脸庞像从前一样挂满泪。爷爷问：“你还爱我吗？”奶奶用力地点点头。爷爷笑了，问：“你会永远只爱我吗？”奶奶想了想，轻轻摇了摇头。爷爷有些失望。

他们生了四个孩子，大女儿聪颖好学，大儿子勇敢能干，两个小儿子聪明顽皮，老给爷爷奶奶惹祸。他们一家很幸福。可这幸福没有持续太久，就因为爷爷被打成右派而结束了。在“划清界限”与“同流合污”之间，奶奶义无反顾地选择了后者。于是她同样被批判，同样被游街，同样忍受屈辱。爷爷的感激埋在心底，奶奶的关爱小心翼翼。十多年后，夫妻俩总算默默无闻地挨过了那段时日。爷爷平了反，爷爷奶奶的儿女也拥有了自己的事业。

他们的大孙子结婚了，婚礼在教堂举行。神父问：“你愿意嫁给他吗？”爷爷也轻轻问依偎在身边的奶奶：“你爱我吗？”奶奶抬起头：“我爱你已经爱到额头上起皱纹了。”爷爷继续问：“你会永远只爱我吗？”令他失望的是，奶奶如同从前一样地摇摇头。

奶奶病了，越来越重。爷爷日夜不眠地守候在病榻前。医生说，奶奶已经太老了。爷爷很悲伤，但他知道这是必然，他们总算走到了这一天。奶奶让爷爷取下了氧气罩，微笑着问：“你爱我吗？”爷爷含泪点着头。奶奶说：“我也爱你，直到走完这一生，我才敢说‘这一辈子只爱你’。”

摘自《读者》

恋爱感觉

张红梅和李德全是在上世纪80年代初经人介绍认识的，相识不久就匆忙结婚。

二十多年来，他们的生活沿着一条笔直的线，波澜不惊地进行着。李德全属于家庭观念很重的男人，十分顾家，很会烧饭菜，脾气又好，夫妻几十年，红过脸的次数，掰着手指头都能算清楚。照这样理解，张红梅该是幸福女人。那天，女儿不经意间的一句话，却改变了她的生活。

正在热恋之中的女儿被幸福感充满着，一天，她突然对母亲说：“您知道吗？我们对视的瞬间，似乎有触电的感觉。”

晚上，张红梅躺在床上，翻来覆去地想：人们都说，没谈过恋爱的人生是残缺的。当然，张红梅知道自己这个年龄，人老珠黄不说，再去谈恋爱，她也拉不下那个脸。但她觉得一切的症结，就在触电的感觉上，弄明白这种感觉，一切问题也就迎刃而解。

翻来覆去，终于弄醒了丈夫，张红梅拍拍丈夫的脑袋，低声问：“老李，触电的感觉是什么样？”

丈夫翻身朝里给了她一个脊背。她不肯罢休，将丈夫的脑袋扳过来，面对自己，说：“老李，触电的感觉到底什么样啊？”

丈夫不耐烦地说：“你试一下，就知道了。”

张红梅无心睡眠，披衣下床，来到客厅，打开电视，一个接一个地搜台，心思还是在触电的感觉上。

她下定决心尝试一回。张红梅这样想：“一辈子匆匆过去了，偏偏留下这个遗憾，不甘心啊。”

“今天豁出去了。”她咬咬牙，一跺脚，起身扭掉头顶的白炽灯，尽管有些犹豫，心中的那股渴望又容不得她打退堂鼓，最后，还是将食指伸进灯里，火花如蛇，张红梅感到全身一麻，就栽倒在地。

客厅里的声响惊醒了李德全。李德全揉着惺忪睡眼走出来，发现昏倒在地的张红梅。

张红梅就这样住院了。天快亮的时候，她终于醒了，人却呈出痴呆相。她定定地看着女儿，良久才说出一句话：“谈恋爱，真是活受罪。” **摘自《齐鲁晚报》**

最深沉的爱情

约翰·克劳斯顿是英国的一位牧师，他的妻子比尔·玛丽亚是一名护士。1854年，38岁的约翰·克劳斯顿患了食道癌，生命即将走到尽头。

当死神向克劳斯顿逼近时，他并不为自己的生命担忧，而是为妻子今后的幸福着急。知道自己时日不多的克劳斯顿，抓紧时间为实现自己人生中最后一个心愿而努力。他印发了大量的传单，传单上写着：我，约翰·克劳斯顿，将不得不向这个我依恋的世界说再见。我知道对于我的妻子而言，这是不公平的。我说过要陪她白头到老，可是我不能完成这个爱的使命了。希望有一位善良、懂得爱的男人来替我完成这个爱的使命。因为我的妻子——36岁的玛丽亚是一位善良、美丽的女护士，她是一个值得爱的女人。她的住址是亚马雷思镇教堂街9号。

无论玛丽亚怎么劝说，克劳斯顿都不为所动。他站在亚马雷思镇最繁华的街道上，将为妻子征婚的传单一张张散发到路人手中……

克劳斯顿走了，玛丽亚按照克劳斯顿的遗愿，在他的墓碑上刻上：我，约翰·克劳斯顿，将不得不向这个我依恋的世界说再见。我知道对于我的妻子而言，这是不公平的。我说过要陪她白头到老，可是我不能完成这个爱的使命了。希望有一位善良、懂得爱的男人来替我完成这个爱的使命。

一百多年过去了，那块刻着“征婚启事”的墓碑依然伫立在克劳斯顿的坟前，凡是见过那块墓碑的人都会对克劳斯顿充满敬意，为他那份对妻子最无私、最深沉的爱情。 **摘自《太原晚报》**

男人的愿望

一中年男子走进餐厅。他身后还跟着一只鸵鸟。“一个汉堡，外加一只烤鸡。”男子坐下后，对店里的女服务生叫道。“还有我，我和他要的一样。”坐在男子身边的那只鸵鸟嚷道。“9美元40美分。”女服务生在男子买单时说。男子向口袋一掏，看也没看就递了过去，分文不少。

女服务生好奇地问道：“你怎么能做到这一点？”那男子说：“我遇上一位神仙。他说可以满足我两个愿望。我的第一个愿望是，口袋里总是有足够的零花钱，让我买想要的东西。”

“太棒了，”女服务生叫道，“那你的第二个愿望是什么？”

“我想要一个长腿的雌性动物，无论我说什么，她都能和我保持一致。你能明白我的意思吗？”

女服务生点了点头，“后来怎么了？”男子沮丧地答道：“神仙说这样的雌性动物不好找，于是他给我弄来一只雌鸵鸟。” **摘自《意林》**

老房子着火

“中年男人的婚外情，就像老房子着了火，燃得快，熄得也快，不必去救。”说这话的，是我以前单位工会的李主席。

我曾经在一个国有企业干过工会工作。工作无外乎就是“吹拉弹唱、打球照相”等等。干这项工作不需要什么激情，只要有耐心，会说几句宽慰人的话就行了。

李主席说，几万人的大企业，哪天没有结婚离婚之类的事情啊？事情经历得多了，自然就见怪不怪。

李主席是个女同志，年纪已过不惑。大凡工会都有这么个角色，发放避孕药具，看望难产的女工，这些工作若是让一个未婚的男人去做，毕竟不方便。

那是一个下午，张科长把我从会议室叫出来，说找我谈谈。我有些受宠若惊。在僻静处，张科长说着说着竟眼泪鼻涕花花地飞流直下。你想想，一个大你两轮的老男人在你面前哭诉，你会怎么想。苍天哪，这就是爱情的魔力。

原来，张科长爱上了一个20来岁的小姑娘。我眼睛盯着张科长荒芜的头皮，我心里问，凭什么？

爱情真是难以捉摸，堂堂一个张科长，手下几百号人，怎么突然就像脑袋被驴踢了似的。张科长说，他那糟糠闹得死去活来，找到工会，叫工会为她做主。可李主席竟这样对张科长的糟糠说，你的目的是什么？是往那姑娘怀里推呢还是想往家里拽？如果不是为了成全他们，你就像没看见似的，打你的麻将，遛你的狗，这样的男人都是破旧的草房，他还等着政府征用呢，也许。分文不值！这席话李主席也说给了张科长听。

谁知道，张科长及其糟糠在这一点上结成同盟，他们认为，李主席不配做工会领导。

张科长说，李主席这个老女人（其实，李主席比张科长小好几岁）到更年期了，她懂什么爱情？

于是，张科长就找到我，总算我也是工会的一个卒子。看着张科长坠入爱河不能自拔的倒霉样，我就想笑。李主席早就对我说过，中年男人搞婚外情就像一间破草房着火，烧得快，可没两下就偃旗息鼓，因为，根本就没什么好烧的。

我体会李主席的话，觉得她总结得很有道理。中年男人经不起“野火”烧，不是他对爱情不真挚，也不是缺乏责任心，而是中年男人已经过了半辈子，把一切都看得太清楚了。就说张科长吧，别看他嘴上信誓旦旦地说，要选择“新生活”。其实，他所谓的“新生活”，不过是和那个二十来岁的小姑娘，把曾经走过的路再走一遍。他又不傻，他能不知道未来的“新生活”是什么图景？

果然，没多久，我就在马路上碰见了张科长一家。他怀里抱着个孩子，一边是他的“糟糠之妻”，后面跟着一对年轻人，应该是他儿子、儿媳妇。

李主席的话，有道理。

摘自《剑南文学》